

社会建构的修辞维度研究

朱虹宇 (Zhu Hongyu)¹, 孙继成 (Sun Jicheng)²

摘要: 社会建构有现实维度, 亦有修辞维度, 两个维度在实际社会建构过程中相互融合。如其所是地接受社会呈现出的客观实在, 将所有眼见视为绝对现实, 就有可能忽略修辞的建构属性对现实的改变; 过度怀疑现实, 将眼见之物视为修辞产物, 则有可能陷入修辞决定论的语言陷阱。本研究承接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讨论, 以修辞为理论立足点, 关注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诸多方面, 包括科学、政治、社会认知、国际关系等, 旨在为探讨修辞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建构提供观点支持, 同时推动公众以修辞的视角批评性地看待社会现实, 避免被动卷入有害的现实建构之中。

关键词: 修辞; 社会建构; 科学; 政治; 社会认知; 国际关系

Title: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Rhetoric

Abstract: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both a realistic dimension and a rhetorical dimension.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essentially distinct, but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y have merg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in terms of precedence and importance. If one uncritically accepts the objective reality presented by society and views all observations as absolute reality, it may be possible to overlook the constructive attributes of rhetoric to reality. Conversely, adopting an excessively skeptical attitude towards reality, viewing all observations as rhetorical constructs, may lead to the danger of falling into rhetorical determinism.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rhetoric, the authors have elucidated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rhetoric in social reality construction, such as science, politics, public cogni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multaneously, it extends the discussion to examine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hinese diplomatic rhetoric within the unique social context of China. The aim i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critically engage with social realities while maintaining a rhetorical mode of thinking, thereby having a clea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and firm stance in complex information networks.

Keywords: rhetoric; social construction; science; politics; social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¹ 朱虹宇 (Zhu Hongyu),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 西方修辞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电邮: hongyu_zhu23@163.com。

² 孙继成 (Sun Jicheng) (通讯作者),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口述史、国际汉学、典籍翻译及现当代文学英译。电邮: jichengsun@sdut.edu.cn

社会学家认为世界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建构的，我们“很难获得根本的、客观的真相”（Jasper & Young, 2007, p.270）。如果始终看不到“现实背后的现实”，就有可能产出“假象之中的假象”，使社会发展的方向逐渐偏离本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个人通过在集体中的互动学习，集体或者社会因素会渗透性地影响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从该点来看，建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生活于社会中的公众的认知框架，可以引领大众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

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陈波，2014, p.121）。福柯的语言思想和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均体现出话语和符号“成为社会主体建构身份、建构事实以及建构彼此关系的手段”（田海龙，2014, p.19）。后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语言力（language power），是一种权力，语言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孙吉胜，2008, p.27）。Christie（2005, p.16）指出，“语言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已存在的社会现实，它还主动地参与建构这种现实”。福柯将“话语秩序”概念引入研究，将控制话语视为掌控意义的途径（田海龙，2014），但是并非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语言力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潜力，因为有的语言不参与社会活动而被直接消解于小范围环境，我们认为后建构主义中所提及的造就社会现实的语言具有实在意义或交际意义，也是带有对话性和目的性的语言，即修辞。修辞作为使能条件参与社会建构，修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修辞反映社会现实，二是修辞参与建构社会现实。修辞参与建构社会现实体现于修辞在科学、政治、认知等多个方面的作用。随着对修辞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成熟的使用，建构社会现实的这一功能不断发展更新，可以服务于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不同现实目的。

新修辞学持有修辞具有建构属性的观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同样指向语言对社会活动的建构功能，如论及身份建构时，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运用建构着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并帮助语言使用者实现其社会活动的目的”（田海龙，2018）；论及意识形态时，批评话语分析指出，话语参与意识形态工作（Fairclough, 2011），而意识形态又反过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话语（van Dijk, 2015）。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肯定了社会现实的被建构属性，同时揭示出修辞与话语的建构属性。然而，修辞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与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具有本质区别，体现于修辞与话语分属两个语言研究领域，两者虽然都关注语言与社会的互动互构，但它们却建基于不同的理论阵营和学术视野。相较于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阐释，修辞的社会建构属性研究还比较落后。本研究承接批评话语分析中对话语之建构属性的讨论，以修辞为理论立足点，关注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诸多方面，包括科学、政治、社会认知、国际关系等，旨在为学者探讨修辞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建构提供观点支持，同时推动公众以修辞的视角批评性地看待社会现实，避免被动卷入有害的现实建构之中。

一、科学的修辞建构

科学成果通过修辞向公众传播并在传播中巩固其社会功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的力量。在以“科学”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之前，这些成果需经过严苛筛选与验证，筛选与验证的过程即是积累修辞资源的过程。

（一）科学的或然性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词典编辑室, 2017), 也是一种衡量事物是否具有“客观性”的标准, 因此科学之“或然性”(probability)弱于其他知识体系或学科。一些权威的修辞学家曾明确反对科学修辞的存在理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阐述修辞外延时指出, 或然性是修辞的重要特性之一, “那些具有充分确定性, 只允许一种正确见解或结论的事物(如科学范畴内的事物)不在修辞讨论的范围之内”(刘亚猛, 2018, pp. 63-64)。修辞情境论的提出者 Bitzer 认为科学语篇不属于修辞范畴, 科学语篇的受众由“接受知识”的人组成(Bitzer, 1968, p.8)。尽管或然性是修辞存在的前提,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修辞的否定态度在当前社会中却失去了生存土壤。

Latour & Woolgar 早在 1979 年就指出即使最科学的观点也依赖修辞来说服他人。Gross 在《科学修辞》(*Rhetoric of Science*)一书中强调修辞是通往科学的路径, 甚至给出了“科学主张只是说服的产物”(the claims of science are solely the products of persuasion)(Gross, 1990, p.3)这一具有颠覆性的观点。Davis 尖锐地解释了技术性交流(technical communication)与修辞的关系, 认为如果说服只是意味着有效的交流, 那么修辞自然是技术性交流的一部分, 而如果说服意味着“赢得信服的特殊艺术”(a specific art of winning conviction), 那么修辞则不属于技术性交流, 甚至成为不合道德规范的交流方式。

Davis 的观点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修辞”含义的界定, 修辞是传统意义上的说服艺术, 还是旨在促成有效交流的方式? 该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应如何看待科学交流与修辞的关系。Davis 坚持认为科学话语的核心是科学而非话语, 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存在可取之处, 但并不赞同他对传统修辞与说服艺术的抵触。修辞以说服为重心, Burke(1969)提出的“认同”概念占据了修辞研究的重要地位, 但他同时表示认同观是为了补充而非替代说服观。Grinnell(1999)对 Davis 的观点也提出质疑, 认为 Davis 所划的修辞与公开辩论之间的明确界限在科学文章中并不存在; 科学论文不是科学实验的过程, 而是实验过程的“宣布”(announcement)。

(二) 修辞对科学的影响

当代科学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佩拉(Marcello Pera)认为, “修辞学进入科学领域并不是像反方法论者或者非理性主义者那样要彻底摧毁传统科学的两根支柱, 而是要为真理与表述、认识与信念、客观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提供一种解决方法, ……从而挽救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成素梅、李宏强, 2004, p. 20)。佩拉所欲建构的是修辞学对科学的“补充”甚至“拯救”关系, 该目标的合理性在于科学成果需要通过话语和图像等修辞途径公诸于世, 困难在于科学在人类认知中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证实度, 任何撼动科学之科学性的行为都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即使科学从伊始就以修辞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建构科学”需要多方面的协调, 其中最关键的是科学本身的科学性, 即对绝对现实的反映与阐释程度, 程度愈深入, 科学性愈高, 有关该事物的科学本质愈坚定, 但是具有绝对性质的科学占据科学研究的少数, 多数是带有建构色彩的“科学现实”。即使现在被视为绝对现实的“日心说”也经历了曲折的建构过程。哥白尼发现地球运转规律并提出“日心说”伊始遭到公众谴责和宗教迫害, 彼时“地心说”是被宗教与统治阶级建构出的“科学现实”而被社会公众视为绝对现实。政治、宗教、社会阶级等因素皆可影响甚至决定科学走向, 隐藏其后的不平等修辞权力是致使有些科学逐渐偏离正轨的主因, 更进一步来看, 政治、宗教、社会阶级等因素导致了修辞权力的不平等, 而不平衡的修辞权力若落于不遵循科学精神的修辞者手中, 将不可避免地使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学说

受到推崇，修辞是推崇的途径，而话语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则为目的。

本研究并非提倡“修辞决定论”并否认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而是从科学中抽离其所携带的修辞特质，为全面看待科学和科学发展提供可能的视角。虽然科学具有修辞性和建构性，但是科学本身仍是客观性和科学性最为显著的知识体系之一，在当前的人类智力范围内，科学的说服力依旧占据高位，而科学的修辞性与建构性主要依托于对某些现象与原理的选择性呈现与阐释，以及对它们的呈现方式与阐释方式。如果被视为圭臬的科学亦能通过修辞得以建构，那么其他真实性难以得到证实甚至转瞬即逝的事物与事件就更有可能被重塑，长此以往，修辞的建构功能已浸润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二、政治的修辞建构

修辞通过象征符号参与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也是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民众以修辞为切入口，与其他人形成联结并组成共同体，并最终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共同体中的成员接受先前修辞的影响并巩固现有修辞，还将依据政治环境产出新的修辞。

（一）修辞与国家认同

“国家”是一种政治象征，民众通过对象征符号的认知与接受聚集并团结起来。政治象征以国家为中心，不断形成更多符号，逐渐被根植于民众认知，演变为稳定的认知底色。社会现实在时代更迭中被一个个象征所建构，作为政治象征的修辞推动塑造出一个个政治实体和政治现实。国家作为政治象征的典型代表，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淘洗，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为人类发展提供庇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划了人类的演进形态。

引导公众树立国家认同意识是修辞在政治场域中的任务之一。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需要能够说服人、掌握群众的国家与国家制度的理论建构”（林尚立，2013, p.45）。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与可信性是其说服力的来源，而将理论传达给公众并获得支持，则须以说服性的修辞为路径。张媛（2025）以《民族画报》为例，发现其封面图片采用了不同的视觉框架和修辞策略，引导少数民族在图像的共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修辞者“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述模式，激发受众对国家认同的心理需求，建构起公众之间可共享的国家认同所需要的共有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鞠玉梅，2021, p.55），进而突破个体间的割裂，以共同性唤起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自此，修辞对政治局势的擘画和对社会事实的建构作用达到一定高度，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二）修辞与想象的共同体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伟大产物，它通过看不见的手将数量庞大的人和国家联合成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团体，逐渐衍生出自洽能力，能够和平处理内部矛盾并抵抗外部干扰，其中“想象”的力量不容忽视。Benedict Anderson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固有限制性和独立性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显示出人类在形成现代社会形态的过程中，通过“想象”的力量建立政治共同体，进而演化成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此处的“想象”指在自身认知基础上衍生出的对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抽象认识，想象力的核心是联系与抽象的能力。在群体社会中，成员对共同目标的渴求构成一种想象，相互之间

形成了隐性依附关系，而后将这种依附关系显化为制度、规则、传统等表现形态，政治在这些表现形态中影响力最大，对社会及个人的发展产生直接作用。政治所具有的想象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或然性，即政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大众的形象发生变化。或然性意味着可辩与可变，在辩中求变，才能不断优化策略，将对政治想象的建构与现实接轨，找到符合当下现实情境的最佳发展路线。辩什么和如何辩的问题在根本上属于修辞问题，政治修辞推动建构政治想象和政治实体，进而建构社会现实。

如何看待修辞与想象的关系？有话语的地方就有修辞。根据大修辞观，修辞是语言发挥作用的路径，是人类通过语言触碰世界的渠道。凡是经过“语言化”的事物都带有修辞性质，人们通过修辞认识世界并建构认知体系，亦通过修辞推动建构和改变他人的认知体系，而认知体系的本质就是想象与现实的一系列交织。如果修辞能够催生并阐释或然性，则能够重新编织想象和认知，建构新的现实。政治修辞正是以这种形式，在社会现实和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出新的社会现实。我们通过修辞建构出获得普遍承认的现实，从中获得与自身相关的现实并用以指导行动。刘亚猛曾言：“（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质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实力’（soft power）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旺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亚猛，2004，p. 3）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中，修辞成为维系关系的支撑性渠道之一。

三、社会认知的修辞建构

存在与阐释是两个维度，存在是否能够被阐释，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被阐释，都是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修辞是人类接受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亦是阐释存在的话语路径。修辞者如何阐释存在影响着受众如何认识与理解存在，即使修辞者自身对某一存在的认识并不客观甚至虚假，但其对修辞的调用和设计却有可能使受众坚信该存在的真实性。受众在接受修辞者的阐释之后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采取行动，即使采取行动的时间和情境并非即时即刻，但是修辞者及其阐释已在有行动能力的受众认知中产生潜在影响，为受众的后续行为提供滋养，此时新的社会现实或者社会存在被建构，而新的修辞阐释即将开始。总而观之，修辞参与社会建构的态势是多层次的。从物质层面看，修辞推动社会具体现实存在的形态改变；从抽象层面上看，修辞影响公众的认知、情感、信念等，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起塑造作用。

（一）修辞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

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公共政策的制定等与修辞有关。公共政策“既是修辞行为的建构目标，也是修辞行为的建构结果”（刘涛，2022），它充当修辞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的媒介（Robert, 2010），周旋于抽象概念与客观事实之间，将修辞融入到社会建构过程的初始与基础阶段，使其在社会现实中悄无声息而又无处不在地产生影响。Frawley（2018）在分析英国社会的幸福问题（happiness problem）时指出，幸福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制度化，修辞领域中的叙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Monahan 和 Best（2023）指出，“时间”本身就是观点制定者用来进行劝说的修辞方式，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与时间有关的表达方式得到解决，或看似得到解决。例如，节日的制定可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具体表现是能够塑造公众认知，巩固文化传统，甚或促进消费等。

修辞的内核是说服，没有明确目标指向的话语不能被称为修辞。修辞者以取效为目的对受众展开修辞实践，“修辞者一旦调用各方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就有可能影响受众的认知并进而改变行

为”（鞠玉梅，2021, p. 55），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又将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在历史中不乏通过修辞影响受众进而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例如，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1963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该演讲作为一场融合民权运动背景的修辞事件，促使联邦政府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以更充分地实现民族平等，用“最雄辩、最诗意、最不加掩饰的”修辞话语推动了合法消除种族隔离。潜藏于事件背后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乃至个人因素等共同构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同时修辞提升了事件发生的概率或加速了其进程，直接参与塑造历史和社会现实。

（二）修辞与公众认知和公众价值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林尚立，2013）。修辞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社会的人，继而改变社会。人的“媒介作用”不仅体现于身体行动，还体现于认知。对某个事物采取的修辞描述方式塑造或影响着受众对该事物的看法。Gelman（2003）指出，一旦某个名词被用来描述一个人或现实，它就会实质化（essentialize）其所描述的内容，从而构建出存在于其指涉之外的实体或特征。这些“实体”与“特征”被人们嵌入认知并将其视为现实，继而有可能真正地改变现实，建构出新的社会形态。对于修辞与公众认知的关系，Lippmann（1998）在《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指出，现实世界过于复杂庞大，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更为简化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进而才能对其做出行为上的反应。修辞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方式，挑选信息、组织信息、传递信息等一系列与现实世界接触与疏离的行为，皆是修辞参与构建公众认知的方式。我们或可认为，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修辞化处理的信息。修辞是公众认识世界的渠道，脱离修辞，我们将陷于混沌无序的信息世界，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独特世界观与价值观，而经过修辞的筛选，公众的认知框架能够得以逐渐成型和稳固。

修辞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还体现于公众的价值观。早在1987年，Condit就指出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可以通过修辞加以建构，给出了建构过程中所需要的修辞观点，甚至认为“没有修辞来产生与维持道德，人类生命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削弱”（Michelle, 1987）。“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成，都离不开话语符号的支配和操控”（马忠、达雅楠，2020），价值观念生成过程中，修辞充当价值观的传递者与受众之间的渠道，而传递者是否能用符合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s）的修辞表达来说服受众，则直接关系到价值观念的接受效果甚至存亡。例如，生态环保理念的传播和普及并非理所当然，需要修辞充当媒介，促使生态环保理念在增长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修辞与知识生产

修辞参与生产“知识”，公共修辞是“通往公共知识生产的修辞实践”（刘涛，2022）。科学修辞即为一种修辞参与生产知识的实践。“近代以来西学的特点往往是原理要超越经验”，因此衍生出原理性的知识形态，这种形态更接近于本文先前讨论的“科学”内容，修辞在知识传播中担当工具性角色，而“中国过去的知识一般更多是经验的归纳”，属于“经验形态知识”（韩震，2021），该知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修辞影响更为明显。经验性知识因为缺少能够简化的核心原理，又甚少有人能够在一开始就完全吸收他人传授的经验，因此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需要知识持有人化身为修辞者并诉诸修辞努力，使知识被受众接受并在社会中流通，成为公共知识。经验性知识形态在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赋予了中国社会注重总结与哲思的特色，修辞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参与着中国特色社会的塑造。

四、国际关系的修辞建构

国家间的交流背后潜藏巨大的利益和对国家长远的影响，也形塑了国家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力。修辞与经济交往、政治关系、文化沟通、历史发展趋势等配合，逐渐缔造出复杂的国际关系图景。

（一）国际关系的建构属性

国际交往是修辞发挥作用的场域之一，作为修辞者的国家通过影响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可改变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甚至人类行为准则。有学者（如李克、朱虹宇，2022；赵玉倩、杨明星，2022）阐述了修辞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作用，是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因素。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今社会，外交动态易被公众知悉，外交修辞也更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馈。相关研究尤其国内研究多关注具体类型的外交修辞如视觉修辞（杨明星、李莹莹，2023）和隐喻（张巨岩、巩昕岷、宋婧，2010），部分研究从语用论辩视角揭示不同国家外交话语中的论辩和修辞策略。

国际关系的建立、维持或补救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关系的建构，国际利益的损失与获取亦是关系性的建构，因此修辞的建构属性在外交场域可被视为塑造有效修辞的关键。无法适当运用修辞的建构属性将浪费修辞资源，产出无效修辞，导致国际交往中的“自说自话”现象。中国在外交场域中不断提出新概念与新倡议，对其传播并促使其在受众中取效离不开恰当的修辞理论与可行的修辞策略。例如，共情修辞理论在修辞目的的确立、修辞话语内容的设计、修辞话语的呈现三个方面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具体实践路径上的启示（李克、朱虹宇，2022），有益于加快新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通和接受，并推动建构国际社会的新现实，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之下各国产生的归属感、合作倾向、和平意识与团结力等。

（二）外交修辞的建构属性

修辞在有效建构理想化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有可能推翻某些既有现实，建立“虚假现实”。美国宣传其“普世价值”时，运用政治修辞“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把局部认知描绘为代表全人类理想的价值幻象”（马忠、达雅楠，2020, p. 51），这种具有政治蛊惑力的修辞试图使受众接受虚假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修辞者的不正当目的。詹全旺和王志宏（2022）通过修辞分析揭示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方代表采用诉诸同情、诉诸后果、排比等策略，违反了自由规则、举证责任规则、关联规则、未表达前提规则与论证图式规则，故意产生论辩谬误，带来修辞失效。学者们以修辞的建构作用为研究落脚点，推动我们透过诡辩的外壳直抵事件内核。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和流行同样是居心叵测的修辞者利用修辞的建构功能精心塑造的结果，他们“依循叙事的模式化情节，重构历史记忆，解构共同体的整体认同，意欲达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范映渊，2016, p. 95），而认清这一修辞群体的建构手段是消解其建构结果的前提。

当前充斥于国际社会的有关“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的“陷阱话语”暗含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指向，试图凭空建立国强必霸、持续性发展受阻、公信力缺失的逻辑（薛钧君，2019）。这些修辞目的一旦达成，将对中国发展带来直接阻力。用修辞的建构性剖析这些话语背后的修辞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就有可能戳穿“陷阱话语”的泡沫，反击来自外界尤其守成大国的诋毁。此外，西方话语霸权作为一种扭曲的修辞产物，“垄断了政治议题设置权和政治议程主导权，垄断了自由、民族、人权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陈曙光，2020, p. 37），若一元化和霸权化的修辞广泛流

通于国际交往并发挥建构能力，将为中国或其它非西方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发声困难，导致修辞中的“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和真正的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距甚远，使人类社会背离追求真理的历史发展方向。

剖析修辞的建构属性，深刻认知偏向客观中立的修辞现象或一元化的修辞霸权现象，对于中国外交修辞有关键意义。中国作为受众面对其他国家的修辞行为时，以修辞的建构属性为视角，解构修辞者的行为，寻求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例如，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当宣传甚至污蔑，中国受众可从建构视角出发，剖析国外媒体如何从零开始堆砌和搭建材料，逐步建构出“中国形象”，进而瓦解不合理的建构和描述。我们倡导以修辞为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对外传递真实的追求和平的中国外交理念，使其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同时，打造一个覆盖所有国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修辞分析与实践的切入点。

五、结语

修辞过程是一个建构过程。修辞者通过修辞表达，在受众的认知框架中注入新信息，促使受众在新信息的刺激下建构新的认知框架，产生暂时或持续的行动。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看，修辞是建构社会现实、改变社会运行的步骤。修辞在自身的建构性质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建构社会能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认识和改变社会的方式。修辞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影响社会发展。福山指出，“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的具体事件变得皆可理解”（福山，2014），这对人类的认知水平、科技水平和修辞水平提出要求。当前社会中，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促使人们认知水平不断提升，视野日益开阔，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揭开了部分关于世界乃至宇宙的真相。相比而言，修辞水平的进步并不明显。本研究认为，充分认识修辞的社会建构功能并具备一定的修辞能力，将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建构和国际交流。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Asen, R. (2010).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Rhetoric in Public Policy".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01): 121-143.
- Bitzer, L. F.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 rhetoric*, 1-14.
- Christie, F. (2005). *Classroom Discourse Analysis: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Bloomsbury Publishing.
- Condit, C. M. (1987). "Crafting Virtue: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Mor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01): 79-97.
- Fairclough, N., Jane, M. & Wodak, R. (20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 Van Dijk, T. A., pp. 357-379), Sage.
- Frawley, A. (2018). "'Unhappy News': Process, Rhetoric, and Context in the Making of the Happiness Problem".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01): 43-66.
- Gelman, S. A. (2003). *The Essential Child: Origins of Essentialism in Everyday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nnell, F. (1999). "Are Scientific Papers Examples of Rhetoric? Commentary on 'Rhetoric, Technical Writing, and Ethics' (Michael Davi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05): 487-488.
- Gross, A. G. (1990).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sper, J. M., & Young, M. P. (2007). "The Rhetoric of Sociological Facts". In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2, No. 3, pp. 270-299).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Kenneth, B.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ppmann, W. (1998). *Public Opin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Monahan, B. & Joel, B. (2023). "Clocks, Calendars, and Claims: On the Uses of Time in Social Problems Rhetoric".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02): 320-338.
- Vail, M. (2006). "The 'Integrative' Rhetoric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s 'I Have a Dream' Speech".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01): 51-78.
- van Dijk, T. A. (201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s. Tannen, D., Hamilton, H. E., & Schiffrin, D., pp. 352-371). Wiley Blackwell.
- 陈波 (2014):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中国社会科学》(10): 121-142+207-208.
- [Chen Bo (2014).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121-142+207-208.]
- 陈曙光 (2020): "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 生成与解构", 《政治学研究》(06): 37-45+126.
- [Chen Shuguang (2020). "Western Hegemon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Gener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06): 37-45+126.]
- 成素梅、李宏强 (2004): "析佩拉的科学修辞方法", 《哲学动态》(10): 17-22.
- [Chen Sumei, Li Hongqiang (2004). "On Pera's Scientific Rhetorical Methods". *Philosophical Trends* (10): 17-22.]
- 范映渊 (2016): "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 《理论导刊》(10): 95-98.
- [Fan Yingyuan (2016). "Memory, Narration,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Nihilism".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10): 95-98.]
- 范祖承 (2020): "西方修辞视角下中国在国际论坛中的外交论辩策略探究", 《国际论坛》(04): 75-87+157-158.
- [Fan Zucheng (2020).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Diplomatic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International Forum* (04): 75-87+157-158.]
- 弗朗西斯·福山 (201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陈高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Fukuyama, F. (2014).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ranslated by Chen Gaohu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韩震 (2021): "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06): 168-185+207-208.
- [Han Zhen (2021).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Form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06): 168-185+207-208.]
- 鞠玉梅 (2021): "香港媒体'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以《南华早报》粤港澳大湾区新闻文本为例", 《当代修辞学》(05): 54-66.
- [Ju Yumei (2021).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s Media: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o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ntemporary Rhetoric* (05): 54-66.]
- 李克、朱虹宇 (2022): "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110-118+176.
- [Li Ke, Zhu Hongyu (2022). "Establishment of External Identification of a Country through the Lens of Empathy Rhetoric".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2): 110-118+176.]
- 李克、朱虹宇 (20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共情修辞路径",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88-96.
- [Li Ke, Zhu Hongyu (2022).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 Empathy Rhetoric Approach".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2): 88-96.]
- 林尚立 (2013):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8): 22-46+204-205.
- [Li Shangli (201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08): 22-46+204-205.]
- 刘涛 (2022): "公共修辞: 话语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修辞建构", 《西北师大学报》(06): 67-82.
- [Liu Tao (2022). "Public Rhetoric: Public Interest and Its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in Discursive Practice".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06): 67-82.]

刘亚猛（2018）：《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Liu Yameng (2018). *A History of Western Rhetor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刘亚猛（2004）：《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三联书店。

[Liu Yameng (2004). *The Pursuit of Symbolic Power: Reflections on Western Rhetorical Thought*.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马忠、达雅楠（2020）：“揭开政治修辞的幻象：‘普世价值’的话语透视”，《思想教育研究》（05）：50-55。

[Ma Zhong, Da Ya'nan. "Unveiling the Illusion of Political Rhetoric: Penetrating into the Discourse of 'Universal Value'".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05): 50-55.]

孙吉胜（2008）：“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05）：26-36+3-4。

[Sun Jisheng. "Language,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n Postconstructivism".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05): 26-36+3-4.]

田海龙（2014）：“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06）：14-20。

[Tian Hailong (2014). "Discourse Theory and Linguistic Semiotics: Foucault's and Bakhtin'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06): 14-20.]

田海龙（2018）：“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与同”，《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05）：137-139。

[Tian Hailong. "Academic Thought and Research Path: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New Rhetoric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05): 137-139.]

薛钧君（2019）：“跳出‘陷阱话语’的陷阱——对几种‘陷阱’及其话语体系的反思”，《思想教育研究》（12）：72-76。

[Xue Junjun (2019). "Escaping the Trap of 'Trapped Discourse': Reflection on Several 'Traps' and Their Discourse Systems".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12): 72-76.]

杨明星、李莹莹（2013）：“外交视觉修辞基本原理与话语权生成”，《外语电化教学》（03）：25-31+116。

[Yang Mingxing, Li Yingying (2023). "Diplomatic Visual Rhetoric: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the Making of Discourse Power".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03): 25-31+116.]

詹全旺、王志宏（2022）：“语用论辩学视域下的外交话语特征研究——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为例”，《外语电化教学》（05）：80-87+116。

[Zhan Quanwang, Wang Zhihong (2022). "A Pragma-Dialectic Study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Features: The Case of China-US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05): 80-87+116.]

张巨岩、巩昕嶝、宋婧（2010）：“公共外交与修辞中的隐喻：美国‘911’后公共外交修辞中的系列隐喻”，《国际新闻界》（08）：42-49。

[Zhang Juyan, Gong Xinyang, & Song Jing (2010). "Metaphor as Message Strategy of Post-September-11 U.S. Public Diplomacy".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08): 42-49.]

张媛（2025）：“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视觉框架及其修辞策略——基于《民族画报》封面图片的分析（1955-2024）”，《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3）：54-63。

[Zhang Yuan (2025). "Visual Framework and Its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alysis of the Cover Pictures of Nationality Pictorial (1955-2024)".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03): 54-63.]

赵玉倩、杨明星（2022）：“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与修辞原理”，《当代修辞学》（03）：54-66。

[Zhao Yuqian, Yang Mingxing (2022). "Special Features and Rhetoric Principles of Diplomatic Metaphor". *Contemporary Rhetoric* (03): 54-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7）：《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2017).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he Commercial Press.]